

农村积分制背景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李蕾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海南省琼海市，571400；

摘要：积分制是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模式，旨在通过积分与奖励挂钩的方式，加强对农民日常行为的引导。积分制运行中包含着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本文从积分制这一特定的基层自治实践出发，考察现实积分制运行过程中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做法、存在困难、有效经验等。在积分制背景下，进一步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进行分析提炼，形成可供借鉴的一般经验。

关键词：积分制；传统道德；思想政治教育

DOI：10.69979/3029-2700.25.12.005

引言

目前，围绕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村民自治水平，各种治理模式层出不穷。最近几年，积分制在基层治理领域得到充分运用，其有力地促进了乡风文明发展。在积分制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农民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有效开展，提高了农民群体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道德素质，积分制也逐渐成为助力新时代农民养成正确价值观、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有几个不同方面：一是以不同的历史分期为视角，从新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革命时期、延安时期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出发，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经验。二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分析研究，指出了经典理论对当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作用。三是以不同政策背景为视角，研究特定政策背景下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包括乡村振兴视角、城镇化进程视角、精准扶贫政策视角等。对农村地区积分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视角多为对整体运作的研究。在对农村积分制运行的实际情况调研的基础上，集中于该项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包括积分制运行中的有益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其现象背后的逻辑和理论等，探求积分制运行的逻辑和特殊机制。

总体来看，农村积分制是一个涵盖农民全面生活的自治创新，其目的在于通过一定的激励方式，推动农民以更高水平的行为，进一步地参与到自治环节中来，达到良好的基层治理效果。在积分制发挥作用的各种现实逻辑中，存在一种对农民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即通过积分制和乡风文明银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先进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在农村地区被充分宣传，积分制成

为一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农民群体的道德水平和思想政治素养得到了提高。

1 积分制运行中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情况

对积分制所规定的标准和运行实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的对农民群体的思想观念的引导和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

1.1 积分制的现实运行形式

在乡村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等政策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实现基层群众自治，调动群众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积分制被制定运行并逐渐推广开来，其是一种针对乡村或社区等基层地区的管理机制和模式。与积分制同时运行，并且共同发挥作用的还有乡风文明银行、乡风文明领导小组等群众组织。具体来看，积分制在乡村地区的现实运行主要通过对文明行为进行量化、标准化。在积分制规定中，大多数农村都对村民全部的参与行为分类赋分，肯定多种参与行为，扩充村民参与行为的领域，包括参与村庄公共管理和村庄公共事业等。同时对村民的个人生活行为进行分类赋分，肯定多种文明行为，既包括村民科学管理个人日常生活的行为，也包括为村庄整体发展提供力量等。例如村民自觉管理个人家庭生活，学法守法，维持良好的家庭卫生，参与文明家庭评选；照顾弱势群体，尊老爱幼；简办红白事等促进乡风文明发展的行为。针对以上行为内容，确定加分和减分的标准。

1.2 行为标准蕴含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

在积分制所具体规定的加分和减分等行为标准中，深刻蕴含了诸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道德、集体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

务原则等。在乡村场域，这些思想通过明确的行为准则引导村民们在日常行动中践行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从而促进乡村地区整体和谐与持续进步。在积分标准中，村民按时参加村民大会，有序发言，对村庄发展提出有益建议；村民配合移风易俗活动、人居环境整治等公共活动；在公益事业、修路建桥等活动中捐款或出力等行为都是对村民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强调，充满集体主义精神。发现村内街道存在脏乱差及时与环卫人员联系或主动清理；依法依规自愿自行拆除违建；征地项目、拆迁中，主动配合，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认领心愿墙帮扶项目，结对帮扶贫困户；长期照顾无亲属关系的鳏寡孤独、弱势群体；庭院内外清洁卫生，不在门前、街道、公共场所堆放柴草、粪便、建筑垃圾等多项标准引导村民规范自身行为、团结邻里、乐于助人等，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体现。

1.3 以行为激励为主要途径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乡村地区的积分制实质上是一种基于激励机制的治理形式，作为当前基层地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它通过设计积分规则和提供多样化奖励，如物质奖品或荣誉表彰，旨在正面引导村民遵守社会规范，鼓励优良行为如志愿服务、环保行动、简化红白喜事等，同时有效减少社会失范行为如违规乱纪或道德缺失。这一制度通过积分累积激发村民的参与积极性，不仅实现了在乡村场域政治动员的目标，还能促进公民责任感的提升，从而强化乡村治理的协同性和可持续性。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对公事的参与、为集体活动出力等这类行为被充分肯定与褒奖，使村民们从现实上更进一步地意识到自身参与的重要性与意义，从而树立更加强烈的自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利于集体主义精神和自治精神等在乡村地区的传播与弘扬。村民爱护环境、尊老爱幼、和睦邻里等一系列文明行为也在获得积分、参与评奖等环节中，以物质奖励的形式被充分认可。这样的奖励机制有利于推动村民逐渐意识到责任感、集体主义、环保意识、孝亲观念等的现实意义，并在长期的行为中提升思想水平和政治素养。

2 积分制背景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困境

积分制在基层治理领域的充分运用有力地调动着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引领了乡风文明建设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对村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在同时进行着，通过积分奖励，有利于基层社会和谐发展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被充分认可和发扬。但同时，积分制这一特定

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也与乡村场域的消极传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给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开展带来了困境。

2.1 制度规定与固有行为模式的矛盾

正式的积分制度往往经历了复杂的制定出台程序，而不是在乡村地区和村民内部自然形成的模式。在乡村地区实际运行正式的积分制时，村民们已有的行为习惯就会对积分制规则产生反弹，消极的行为习惯也与积分制的内涵相违背。具体来看，大部分乡村地区存在人口流动性低、稳定性强，人情社会习俗明显等特点，村民们习惯于“找熟人”。在此情况下，强硬地执行积分制就会被冠以“没有人情味”的负面特点，可能会导致积分制运行面临更大的阻碍。此外，村民之间的个体差异较大导致积分情况两极分化、部分村民缺少规则意识等也给积分制的运行推广带来了一定的现实阻碍。

2.2 制度规定与消极思想观念的矛盾

一是村民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普遍消极，缺乏基本的主体责任意识与主人翁精神，主动参与村务治理的使命感较为薄弱，往往将自己定位为公共事务的旁观者而非建设者。二是村“两委”在动员村民参与方面效能不足，认同感偏低。在处理村内公共事务时，村干部习惯于大包大揽、亲力亲为，常以行政命令方式强制要求村民配合，未能有效激发内生动力。过多地包揽全部事务增加了村“两委”的工作负担，压缩了村民的参与空间。三是对“舶来的”正式制度，即积分制管理制度，存在深层认同障碍。村民及基层组织对该制度缺乏内在的价值认可，仅将其视为上级下达的行政考核任务被动完成，未真正内化为行为准则。

3 农民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

3.1 寻找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基础

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适时调节教育方式，充分挖掘农民群体内部原有的、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契合的传统道德，以此作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基础。这些传统道德是根植于乡土社会的伦理规范，因其历史延续性和生活实践性，构成了农民认知与行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在充分运用并激活这一深厚的原有传统道德基础上，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则会更易找到切入点和情感共鸣点，其开展过程将更为顺畅。农民也因其符合自身熟悉的价值评判标准和行为模式，而更易于认同和接受与自己的传统道德模式方向一致的教育内容。具体来看，农民群体内部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往往

自发形成并传承着一种朴素而稳固的传统道德和伦理规范体系。例如，强调为人处世的忠厚仁义、待人接物的团结友爱、维系村庄和谐的和睦邻里、珍惜劳动成果的节约资源，以及安身立命的勤劳肯干等核心价值。这些传统的道德规范通过代际相传、口耳相传、榜样示范等方式，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农民群体的日常行为逻辑和价值判断之中，与新时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友善、和谐等价值、生态文明理念，以及艰苦奋斗作风等核心内容具有天然的、深层次的内在契合性。

3.2 充分利用农民群体内部的舆论约束

农民群体内部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着紧密而频繁的人际互动。这种高度联结的关系网络，构成了典型的“熟人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由邻里、宗族和日常交往编织而成的评价体系，对每个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个体而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具体而言，“脸面”所代表的个人尊严、声誉以及来自周围人的看法与评价，成为每个农民在日常言行和重大决策中不得不反复权衡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由于信息在熟人网络中快速流转以及个体对群体归属感的强烈需求，每一个农民个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都非常容易受到身边亲友、邻居甚至整个村庄舆论氛围的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带动。个体往往表现出从众心理，对群体的主流意见和示范行为有着较高的敏感度和接受度。正是基于农民群体内部这种强大的舆论生成机制和人际约束力，我们可以充分挖掘并利用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辅助力量。通过树立榜样、营造氛围、引导公共讨论等方式，构建积极健康的群体舆论，有效规范和引导农民个体的思想认知与价值判断，从而为深入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和推动。

3.3 采用适中有效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从积分制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来看，单向的思想政治教育难以真正达到教育效果，实现教育目的。如果完全依靠严格的规则和脱离农民生活实际的内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和乡村社会环境格格不入。这是因为，乡村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行为模式，这是一个群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普遍习惯和思想文化。这种习惯和思想对该群体的行为影响很深，一个群体的习惯养成以后，不易改变。特定乡村的村民行为习惯是群体文化，会被全体村民不

约而同地遵守。这种行为习惯对于农民来说具有一种长期性，即使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下，村民们也会以原有的行为习惯为标尺行动。在此情况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完全采取强硬方式，要看到农民群体内部固有的行为习惯和模式，从农民群体的实际出发，根据现实情况因时而动。具体来看，可以根据农民群体的日常生活习惯，如农忙与农闲的作息规律、节庆活动偏好等，以及他们的爱好兴趣，如地方戏曲、传统体育、民间艺术等，采取多样化的教育宣传方式。例如，结合农业技术推广活动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组织乡村文化节或文艺汇演传递政策理念，利用广播、电视或新媒体平台制作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从而有效提升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感和参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 [1] 邓国军.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研究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07) : 69-75.
- [2] 张红霞, 丁海涛.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05) : 135-140.
- [3] 王东维, 李秀秀. 精准扶贫视阈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临沂大学学报, 2018(04) : 84-92.
- [4] 高宝红, 张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索及现实价值 [J]. 学术探索, 2014(06) : 111-114.
- [5] 李祺.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 [J]. 党史文苑. 2017(22) : 25-27.
- [6] 覃雪梅.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 [J]. 党史博采(理论), 2016(04) : 12-13.
- [7] 王亚新, 李卫朝. 乡村振兴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系 [J]. 安徽农业科学, 2021(18) : 270-272.
- [8] 陆艳花.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18) : 230-232.
- [9] 韩俊. 在乡村治理中因地制宜推进积分制 [J]. 农村工作通讯, 2020 (16) : 4—6.

作者简介：李蕾（1997.03—），女，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人，助教，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